

1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发展

1. 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

1.1 解放后面对的历史难题和烂摊子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和发展曾作出过卓越而巨大的贡献。16 世纪以前，中国在上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到 16 世纪中叶，中国与欧洲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大致相当，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但 17—18 世纪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先后建立了较封建社会远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却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基本停滞不前，逐渐落到了西方国家的后面，成为列强侵略和蹂躏的对象，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拯救中国，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这是无数仁人志士不惜牺牲生命、矢志不渝而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抗日战争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全国的解放，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宣告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结束。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人民的解放，为中国奋起直追迈向现代化、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烂摊子，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处于千疮百孔、百废待举的境地。

——落后的农业：农村经济处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阶段，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耕作方式主要是牛耕或人耕，有的地方甚至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根本谈不上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而且由于长期内外战乱，大量耕地抛荒，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加之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低下，农业生产陷于十分恶劣的困境。1949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 11318 万吨，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一些沿海城市的主粮是进口的洋面洋米，广大贫苦农民则是“糠菜半年粮”。

——落后的工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一直占据着中国经济的统治地位。到 1949 年，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 10%。工业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工业固定资产只有 124 亿元，按当时全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只有 22 元。工业布局极不合理，70% 以上的工业分布在仅占国土面积 12% 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占国土面积 68% 的西南、西北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的 9%。部分行业残缺不全，有机化工、化学农药工业、

化学药品原料制造业、合成橡胶工业、机械工业等几乎是空白，汽车、拖拉机、重型拖拉机、精密仪表、飞机制造等行业根本就没有涉及。企业规模小、设备落后，产量很低。到 1949 年，规模较大的由国家管理的国营企业与合营企业为 3326 家，平均每个企业只有 257 人。1949 年钢产量只有 15.8 万吨，仅占当时美国年产量的 0.2%、日本的 5%、世界的 1%。不到目前我国一天的产量；原煤产量 3243 万吨，仅占当时世界产量的 2.9%，也只相当于我国目前 11 天的产量；发电量 43 亿千瓦小时，仅占当时美国年产量的 12%、世界的 5.6%，也只相当于目前我国两天的产量；原油产量更是少得可怜，为 12 万吨，只有当时美国年产量的 0.5%，世界的 0.3%，也只相当于我国目前三分之一天的产量。

——落后的交通运输业：由于战争的破坏，交通运输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到解放前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只有 2.18 万公里，且各地路轨宽窄不一，勉强能通车的铁路只有 1.1 万公里，其中双线只有 867 公里，仅占全部营业里程的 4%，全国没有一条电气化铁路，全部用蒸汽机车牵引。勉强能通车的公路不到 8 万公里，路况质量极差。铁路和公路的地区分布都很不平衡，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和边远地区很少。内河通航里程只有 7.4 万公里，木帆船是内河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沿海港口吞吐能力小，远洋运输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民航事业很不发达，邮电通信事业也非常落后，长途通信主要依靠短波无线和少量明线，电报电话大多数用手工操作，全国有一半左右的省市没有自动电话，约有三分之一的县不通电报和长途电话。

——落后的教育、科技事业：全国成年人中约有 80% 的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 20%，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只有 2.1 人，学校分布很不合理，内地、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国民的文化素质相当低下。到解放初期，我国现代科技几乎是一片空白，与世界水平相差近 100 年。

更加令人焦虑的是，中国不仅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就是同印度这样一个刚摆脱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国家相比，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差距。例如：1950 年，我国钢产量只有印度的 42%，发电量只有印度的 65%，水泥产量只有印度的 53%，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印度的 36%。

新中国的任务就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首先迅速恢复经济，然后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这是一条需要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奋力去开创的漫长而艰险的道路。

1.2 初步形成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

国民经济是一个现代国家范围内各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所构成的互相联系的总体。旧中国，由于外来势力的侵略和本国反动势力的破坏，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不仅传统的农业日趋衰落，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更没有自我发展和生存的基础，有的只是落后的、支离破碎的带有浓厚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国民经济，难以完整地运转。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取消了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没收了反动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经过一系列国家资本改造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和平赎买。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使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 4700 万公顷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随后，逐步引导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经过 29 年的奋斗，

工农建运商各个部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其间历经风雨磨难，但到 1978 年，已经初步形成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保障了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初步满足了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巩固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

——农业生产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种植业格局，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1978 年与 1949 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2 倍，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 1.96 倍，林业产值增长 15.2 倍，牧业产值增长 2.5 倍，渔业产值增长 25.5 倍，粮食产量增长 1.7 倍，棉花增长 3.9 倍，油料增长 1 倍，糖料增长 7.4 倍，猪牛羊肉增长 2.9 倍，水产品增长 9.4 倍。

——手工业得到改造和提高，现代工业逐渐形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基础工业到加工工业，从消费品工业到生产资料工业，从民用工业到国防工业，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到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从沿海工业到内地工业，都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除核电工业外，其余 500 多个工业行业均已建立，基本能够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装备一些重工行业。从 1949 年到 1978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39.7 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各种主要产品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钢、原煤、原油的产量分别增长 197.6 倍、18.3 倍和 866 倍，发电量增长 58.7 倍。

——基本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 5 种运输方式共同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和四通八达的邮电通信网，成为新中国的一个重要物质生产部门。1978 年与 1952 年相比，铁路营业里程增长 1.1 倍，公路线路增长 6 倍，沿海主要港口码头泊位增长 73.8%，民航里程增长 12.2 倍，输油气管道从无到有，达到 8327 公里；客运量增长 9.4 倍，货运量增长 6.9 倍，邮电业务总量增长 6.1 倍。

——建筑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部门，仅全民所有制建筑施工企业自有机械设备净值 1978 年就比 1953 年增长 55 倍。建筑产品（特别是一些大型骨干工程项目）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并带动了建材工业等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安排劳动力就业创造了众多机会，仅从 1952 年到 1978 年，就增加了 674 万个就业机会。对外承包工程日益增多。

——商业活动取得了较大发展，对沟通生产与消费、密切城乡经济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 年与 1952 年相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4.6 倍，其中，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3.8 倍。此外，对外贸易也有了新发展，成为新中国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经济的重要领域和手段。

当然到 1978 年为止，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上、管理上以及结构上都还不甚理想，特别是在 29 年的时间里，饱受天灾人祸的种种干扰破坏，留下了许多缺憾，和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新中国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保障其生存和发展的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奇迹，也为后来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基础。

1.3 制约国民经济活力进一步发挥的体制障碍

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历史课题。建国后的前 29 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许多成就。不仅消灭、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巩固了政权，取得了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等国际行动的胜利，而且顽强地经受住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

推动了国民经济在艰难中的跋涉。但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以及主观上的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失之偏颇，因而从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中叶，极“左”思想严重泛滥，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政治统帅经济，违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形成了简单地以“阶级分析法”和政治理念判断是非的风气，这一风气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造成了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过高估价，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方针政策，建立并运转着一套不合理的体制：

——在所有制问题上：离开了生产力水平，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在城市，严格限制个体工商业的发展；在农村，人为地加快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将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少量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在全国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

——在管理上：排斥市场机制，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其实质是不承认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起作用的事实，盲目追求政治理念上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方式。片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市场调节，将“市场调节”与“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奢望通过当时并不太成熟、并不太科学的计划手段去规划、控制种类繁多的各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消费。国有企业由国家一手包揽，缺乏活力。国家往往从获取最佳效益的目的出发，结果却造成了很多浪费；从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需要出发，结果却出现了长期的物品缺乏，不得不凭票供应。医疗和住房亦由国家统管，包袱越背越重，而广大群众却越来越不满意。总而言之是事与愿违，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在分配上 忽视劳动差别与贡献大小 实行“一平二调”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脑体倒挂”；“不同工却同酬”混淆了“公平”与“平均”的本质区别，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带来了民众进取心和社会凝聚力普遍下降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在对外关系上：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差别”，加上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孤立政策，以至在较长时间内闭关自守，几乎割裂了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一切交往，影响了中国利用外国资源、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正常往来，影响了自身的发展。

——在发展战略上：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增长，对农业生产和消费品工业生产重视不够，甚至牺牲其他产业和人民生活来达到重工业主要是军事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结果使产业结构严重畸形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非常不合理，使国民经济的发展缺乏稳定性。

这种僵化的体制，不适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经济正常而有效的发展，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人民的温饱问题也一直没有能够很好解决。现实对中国旧的经济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1.4 历史提供了一次机遇与风险同在的选择

历史给予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机会是相同的。抓住历史机遇，国家就可能求得发展，民族就有望得以振兴。自 16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再也没有真正抓住历史赋予的复兴机会，富有的只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即使是在本世纪中叶的大约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曾经又一次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然而当时我们正闭关锁国地“赶英超美”，并且不间断

地一次又一次大搞政治运动，国民经济几濒崩溃，历史又一次把我们无情地抛在了后面。1978年底，当我们从“十年浩劫”的余波中觉醒，睁眼向外看世界时，发现其他国家的进步比我们快得多，诺大的地球之上，几乎已无我们的立足之地；同时还发现，我们正面临着本世纪最后一次发展机会，世界产业结构正处于大调整时期，第三次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又正席卷全球，如果我们再不勇敢地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振兴民族经济、强盛我们的祖国了，那样的话，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将是一部无休无止、遭受侵略和压迫的奴役史。可是，毕竟我们封闭得太久了，对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么的陌生，而要参与国际竞争，我们的力量又是那么的单薄。往后，没有退路；往前，道路艰险。世界在关注我们！历史在关注我们！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审时度势，以非凡的气魄和胆略，作出了攸关国家命运、人民福祉的重大抉择。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创了一项充满风险又充满希望的事业，踏上了一条需要我们这一代甚至今后几代人作出牺牲的艰难历程。

由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是前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因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失误和挫折。特别是70年代末期，我国刚从“十年动乱”的浩劫中摆脱出来，国民经济十分脆弱，近十亿人民还在为温饱奋斗着，而整个世界却在60—70年代飞速发展着。沉重的求生存包袱压得我们还来不及对长期形成的极“左”思潮进行彻底、系统的清除，以至其影响仍然在一些方面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行动，妨碍改革开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些都是可以预料和理解的。此外，一些国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日益强大起来的，他们总会想方设法加以限制和干扰，他们总希望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发展，成为大国的附庸，这是我们需要充分估计到并且要认真面对的。

但无论前途多艰险，只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摸着石头过河”，坚持不懈地探索，勇往直前地开拓，就一定能够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此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

1.5 指导思想上的根本转变

思想是行动的指针。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最根本、最要紧的是指导思想的改变。

——从“唯上”、“唯书”到“唯实”。其实质是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做前人未做过的事情，突破传统观念的禁锢和传统理论的束缚，大胆实践，大胆探索。1979年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1984年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1992年又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最重大的突破，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的改革实践。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偏颇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极“左”思想和行动，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确估价时势，认为当前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决定把工作的

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除非打起大的世界大战，否则就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埋头奋斗几十年、一百年，把综合国力搞上去，实现民族振兴的夙愿。这一思想最后提炼总结为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主要内容，成为指导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宗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一、二、三产业并重发展。在建国初期和备战状态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将我国的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在短期内提高到应有的水平，这是应该的、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就必须改变这种过分倾斜的产业政策，而应当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实现各个产业的均衡发展，特别要注重农业的基础作用。应该说，这种指导思想上的改变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明智选择。

——从僵化、封闭的体制到改革开放。闭关锁国，使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严峻的现实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吸收借鉴国外先进有效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利用国外一些生产要素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接纳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促进国内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一真理，也印证了当初决策的正确。

——把计划和市场都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改变了过去排斥市场的做法，将市场也视为调节经济的手段，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致力于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从单一的所有制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既不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大生产的客观形势，是中国经济缺乏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使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纠正了这种片面性，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大力鼓励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使社会再生产充满生机，经济活力空前增强，成为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新的“增长点”。

1.6 发展战略和步骤的转变

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并成为政府的一个战略方针。

第一步 在 80 年代的 10 年中，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一步已提前完成。

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 1980 翻两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现在我们正为之奋斗。

第三步 到 21 世纪的中叶，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篇宏伟的蓝图，需要全体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去共同奋斗。

2. 改革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历史性大发展

2.1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特征

一般将 15 年的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78 年 12 月至 1984 年 9 月。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建设经验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作出实行经济改革、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近 6 年的时间里，改革的重点在农村，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结束了长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超常增长”的新态势，为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城市，主要进行了企业改革试点，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使企业活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与此同时，开始兴办经济特区，开放了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可以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呈现一派喜人景象。

第二阶段：从 1984 年 10 月至 1991 年 12 月。

198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这个阶段，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配套地进行市场建设和价格改革，以及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城市、农村、科技、教育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开放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这中间尽管经历了三年治理整顿、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波折，政治上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并没有改变，出现了被邓小平同志称之为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的大发展阶段，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一部分居民正向小康和富裕迈进。

第三阶段：1992 年 1 月至今。

以邓小平同志 1992 年春的视察南方和当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改革由过去主要突破旧体制转到建立新体制，由政策调整转到制度创新，由单项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改革，由重点突破转向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对外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内陆地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格局。这是中国改革的攻坚阶段，遭受的痛苦也更为强烈，风险也更为巨大，因而所需的勇气和胆略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与改革开放相伴随，经济发展再次进入快车道，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但也带来了通胀再次严重等一系列新问题，宏观调控作为特定的调整手段得到强化。从近三年的实践来看，只要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中国改革开放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2.2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1994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380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78 年增长 3.23 倍，平均每年递增 9.4%。尽管每一年的增长速度不同，而且增幅差距较大（比如：增幅最高的 1984

年为 14.5%，比增幅最低的 1990 年高 10.6 个百分点），但从整个时期平均水平来看，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而且比 1953—1978 年平均增长速度高 3 个百分点，使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

2.3 经济实力迅速增强

首先是国民经济总量迅速扩大。根据《1993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按当时汇率折算，199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之后，居世界第 10 位。这两年，我国国民经济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1994 年 GDP 现价人民币达 43800 亿元，若按世界银行方法折算，在世界排名榜上还可能上升一至两个位次。作为国有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 1978 年的 4488 亿元增加到现在的 2 万多亿元。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有效保障之一的国家财政收入由 1978 年的 1121 亿元增加到 1993 年的 5008 亿元，增长 3.5 倍。国家黄金储备达 1267 万盎司。国家外汇储备超过 500 亿美元。

其次，是建立了比较雄厚而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经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成投产了一批大中型骨干项目，生产水平显著提高。以工业为例，目前全国已有 40% 的产品采用了国际标准，约有 30% 左右的机电产品主要质量性能指标达到国际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水平。在传统工业得到改造和加强的同时，微电子及电子信息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光电子及光机电一体化工业、生物医学制品工业、核电及新能源新材料工业、生态和环保工业、精密仪器仪表制造工业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已在整个工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2.4 三大产业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活力，其重要标志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与 1978 年相比，1994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比重，第一产业由 28.4% 下降到 18.8%，第二产业由 48.6% 下降到 48.5%，第三产业由 23% 上升到 32.7%。第三产业比重已调整到和现阶段国民经济基本相衔接的水平。

第一产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流通体制、调整农产品价格，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农村经济中以单一的种植业结构为主的历史格局，以乡镇企业的崛起为标志，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解决了用 7%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1% 人口的历史难题。从 1979 年到 1994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了 1.19 倍，年均递增 5%。粮食产量增加 0.46 倍，油料增加 2.8 倍，棉花增加 0.959 倍，猪牛羊羊肉增加 3.3 倍，水产品增加 3.5 倍，谷物、棉花、油菜籽、猪牛羊羊肉产量均跃居世界首位。

第二产业：从 1979 年到 1994 年，第二产业长足发展，增加值增长了 4.99 倍，年均递增 11.8%。其中，工业增长 5.02 倍，建筑业增长 4.2 倍。特别是工业，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迅猛发展，整体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国民经济各行业所需的机械电子设备及高科技产品的国产化水平和配套能力大大增强。核电工业从无到有，填补了工业体系中的唯一空白。主要工业

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其中原煤增长 95.8% 原油增长 40% 发电量增长 2.6 倍 钢增长 1.9 倍，水泥增长 5.2 倍，电视机增长 57.6 倍，家用电冰箱增长 272 倍。原煤、水泥、电视机分别由原来的居世界第 3 位、第 4 位和第 8 位跃居首位，钢和发电量分别由第 5 位和第 7 位跃居第一位。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 5%，居世界第五位。

第三产业从 1979 年到 1994 年增长了 3.5 倍 年均递增 9.8%。其中运输邮电业增长 3.1 倍，商业增长近 2 倍。中国城乡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品流转规模日益扩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等各类商品市场蓬勃兴起，国内外两大市场开始对接，全国统一的大流通、大市场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在引导生产、保障供给、配置资源、调节经济运行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高度，目前 90% 左右的商品价格已由市场调节，城乡商品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基础，更受到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1994 年与 1978 年相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3 倍 年均增长 15.7%。运输邮电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铁路营业里程由 1978 年的 48618 公里增加到 1994 年的 5.4 万公里，复线里程比重由 15.7% 提高到近 30% 自动闭塞里程比重由 12.3% 提高到近 1/4 公路里程由 890236 公里增加到 1083476 公里，有色路面里程比重由 73.1% 提高到 88.63% 民航里程由 14.89 万公里增加到 96.08 万公里，管道线路由 0.83 万公里增至 1.64 万公里。各种运输方式完成的客运量增长 2.9 倍，货运量增长 3.5 倍。邮路及农村投递路线增长 5.7%，邮电局所增长 14.9%，电话装机增长 6.1 倍。县以上城市装有自动电话交换机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38.4% 提高到 1993 年的 91.8%。已有 97.1% 的乡、44.7% 的行政村通了电话。邮电业务总量由 1978 年的 11.65 亿元增至 1994 年的 693 亿元 增长 58.5 倍。此外，金融、保险、咨询服务等其他各业亦都有了显著的进展。

2.5 市场供给充足丰富

1979 年以来，国家对工农业产品购销政策、市场流通渠道、商业管理体制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零售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流通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品收购不断扩大，市场货源日益充裕。到 1993 年，社会商业国内纯购进总额达 12322.3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6.1 倍 年均递增 13.9% 超过前 26 年(指 1953—1978 年，下同)平均递增速度 4.7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品收购额达 9578.9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6.6 倍，年均递增 14.5% 超过前 26 年平均递增速度 3.5 个百分点；农副产品收购额达 2506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4.4 倍 年均递增 12% 超过前 26 年平均递增速度 5.5 个百分点。目前市场上商品可谓琳琅满目，种类繁多，消费者要什么，市场上就可以供应什么，吃穿用烧及文化娱乐用品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工业消费品凭票供应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人民群众的生活方便程度、丰富程度大大提高。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调整，政府和消费者的心理素质都已有很大提高，正常情况下，出现大规模抢购现象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人们对中国市场前景是充满信心的。

2.6 建设规模持续扩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体制从宏观管理到微观运行的各个方面，从投资决策、项目管理到建设实施的各个阶段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先后采取了改财政拨款为银行贷款、下放

项目决策管理权限、建立经济杠杆调控体系、引进招标投标等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基本建设基金、成立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和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改革措施，1994年起又设立国家长期开发银行，专门从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融资业务，从而在投资领域形成了以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资金多渠道、项目决策分层次、投资方式多样化和建设实施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为特征的新格局。

建设规模持续扩大，成果丰硕。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由1978年的668.72亿元增到1994年的11354亿元，增长16倍，年均递增19.4%。16年里共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9701亿元，其中，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47846亿元，相当于改革前29年投资总和的6.3倍。生产力布局得到改善，一批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和一批重点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完成，有力地支撑了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今后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79年至1994年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超过4万亿元，相当于前29年的8倍多。建成投产的基本建设项目60多万，其中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1892个。通过基本建设新增的主要生产能力有：炼铁1493万吨，炼钢1333万吨，煤炭开采30352万吨，石油开采19980万吨，发电机组容量12678万千瓦，化学肥料712万吨，塑料142万吨，木材采运596万立方米，水泥4648万吨，化学纤维105.6万吨，自行车725万辆，显像管1653万只，机制糖1935万吨，机制纸及纸板99.3万吨，等等。新建铁路交付运营里程8052公里，新建公路49939公里，新增沿海港口吞吐能力36227万吨。

从1982年开始，在国家基本建设年度计划中，每年都要确定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并在组织施工各环节中给予优先安排，以保证这些项目按时建成投产，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些项目都具有技术水平先进、能源消耗低、自动化程度高、环境保护好等特点。它们主要集中在能源、原材料基础工业和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部门。目前已经建成投产的主要有：能源工业方面：总装机容量为271.5万千瓦、被列为世界大型水电站之一的湖北葛洲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28万千瓦、单机容量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青海龙羊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各为120万千瓦的山西大同第二电厂一期工程和上海石洞口一电厂；总装机容量为90万千瓦的吉林长白山水电站；发电机组容量70万千瓦的无锡利港电力有限公司；总装机容量各为60万千瓦的江苏谏壁电厂四期工程、黑龙江富拉尔基第二电厂和内蒙古元宝山电厂；年产煤能力1500万吨的山西平朔矿区安太堡露天矿；年产煤能力为500万吨的山西大同四台沟矿；年产煤能力各为400万吨的山西古交东曲矿、阳泉贵石沟矿、大同燕子山矿、河北开滦钱家营矿和山东兖州东滩立井，等等。原材料工业方面：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一二期工程；年产水泥155万吨的河北冀东水泥厂；年产玻璃400万重量箱的上海耀华玻璃公司；年产硫铁矿300万吨的广东云浮硫铁矿；年产乙烯各为30万吨的大庆、杨子和齐鲁三大乙烯工程；年产涤纶短纤维24万吨、聚酯切片25.2万吨的江苏仪征化纤联合公司等大型工矿项目。交通通讯建设方面：第一条电气化双线开行重载单元列车的运煤铁路——全长410.8公里的大秦线（大同至秦皇岛）；亚洲最长的长垣东明黄河铁路大桥（10282米）；秦皇岛三期煤码头、天津港新建的四港池三个集装箱码头、上海港九区集装箱码头、连云港杂货码头、宁波港镇海码头、南京新生圩码头、烟台港、青岛港、湛江港、山东石臼港；独库公路、沪嘉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以沪闽和榕穗光缆工程为主体的南沿海光缆工程，等等。科学文化建设方面：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等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尖端科研工程；藏书2000万册的全国最大的北京图书馆、中央彩电中心及发射塔、亚运工程等一批与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项目。

此外，还建设了大量住宅。16年里 城镇共建住宅 26.52亿平方米 农村 108亿平方米，有效地改善了群众的居住条件。

2.7 对外经济贸易活跃

过去，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运行，规模有限，形式单一，发展水平较低。改革开放前 28年，中国进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0.9% 进出口总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8%，而且 60%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农副产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先后围绕下放外贸经营权、改善宏观管理体制、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代理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同时适时地调整了人民币汇率，实现了汇率由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的“双重汇率”向有条件的单一市场汇率并轨，改变了外汇留成及结售汇制度，极大地调动了部门、地方、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经营活力和应变能力，建立起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体制，使我国外贸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经营更加灵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对外贸易无论是在规模和发展速度上，还是在进出口商品结构、市场占有率和贸易国别多元化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世界上 22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其中：亚洲 42个，非洲 57个，欧洲 47个，拉丁美洲 47个，大洋洲 23个，北美洲 5个。日本、香港地区、欧共体和美国是中国较为重要的贸易伙伴。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只有 206亿美元，1984年突破 500亿美元，1988年超过 1000亿美元，1994年超过 2000亿美元，达到 2367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 16.5%。16年里，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0.9%上升到 3%以上，出口总额在世界各国的排名榜上已由第 32位上升到第 10位。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对外贸易方式日趋多样化。工业制成品在进出口中的比重有明显的提高。1994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所占比重均已达 80%以上，比 1980年分别提高 30和 20个百分点。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了由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改变了我国出口商品长期以农副产品为主的格局。

适度举借外债，合理利用外资。从 1979年起，中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并根据国家的承受能力，适度地举借外债，利用国际资本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1979—1994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179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达 939亿美元 来自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对中国的 20多个行业进行了投资。到 1994年末，已有 10多万个外资企业正式投入运营。近些年，利用外资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境外大公司、大财团在华投资增多，中长期开发投资增多，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多，投资领域得到拓展，结构进一步优化。

技术贸易迅速发展。到 1993年上半年为止，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 5136项，合同金额 379.5亿美元，分别比改革开放前 29年的总和增长 5.1倍和 2.2倍。与此同时 出口技术 1484项，合同金额 63.7亿美元，项目涉及二十多个方面，有的高新技术项目已进入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和地区。

海外企业蓬勃发展，对外承包劳务大量增加。中国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是在 1979年实

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事业，海外企业从无到有，由少而多，逐步发展，如今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截止 1993 年 9 月底，境外企业达 4479 家，中方总投资 51.54 亿美元。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已拓展到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16 年来累计签订各类劳务承包合同额 370 多亿美元，完成营业额达到 220 亿美元，派出承包劳务人员近 70 万人次。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公路桥梁建设总公司、中国冶金建设公司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已进入世界 250 家大承包公司的行列。

国际旅游业方兴未艾。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并有良好的旅游基础设施。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经济交往日益扩大，国内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强烈地吸引着国外旅客。1994 年来华旅游人数达到 4368 万人次，比 1978 年增长 23 倍，游客来自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旅游外汇收入达到 70 多亿美元，增长 26 倍。中国旅游业风光无限。

总而言之，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目前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45.9%。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际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可以预期，改革开放将使中国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中国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产生愈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2.8 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体育、民政、环境保护、政法等各项社会事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扬帆奋进，能力、结构、水平、效果均有显著改善和提高，创造了 50 年代大发展后的再度辉煌。

——改革不断深入。在过去很长时期里，社会事业被看作是官办的、花钱的、福利性的事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一场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方位的改革探索，形成了全社会参与、全社会办、面向全社会服务的新格局。以教育事业为例，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过去完全由国家负担的状况，社会各方面的教育投入已经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 1993 年全国教育支出 1060 亿元中，国家财政拨款的比重仅占 61%。

——能力逐步增强。经过 15 年的奋斗，各项社会事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人民群众和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明显提高。到 1993 年底，全国有各级各类学校 143 万所，教师近 1100 万人；各类卫生机构 19 万个，卫生技术人员 412 万人；各类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机构 20 万个，工作人员 120 万人；环境保护机构 7 万个，环境保护人员 8 万人；体委系统职工 14 万人；民政事业单位 10 万个，工作人员 228 万人。这些机构的技术条件、装备水平，这些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都比改革初期有了巨大提高。

——结构有所改善。1994 年以来，各项社会事业努力优化结构、调整专业与布局，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已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单一管理体制下的单一活动内容和方式。教育结构按价值规律需求方向和层次进行调整，体育结构按奥运战略需要予以加强，卫生机构根据服务对象和内容分类配置，文化机构针对市场与非市场特点区别管理，司法队伍按照经济发展与治安形势重点充实，民政事业开拓生产经营型扶贫和社区建设等新领域。1993 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的专科学历学生比重已达 44%，高级中等教育中的职专技术教育的在校学生比重已达 54%，分别比 1979 年提高了 19 个和 35 个百分点。妇幼、口腔等

专科医院由 1978 年的 500 多所增加到 1993 年的 1600 所。设立医疗网点的乡村比重 1993 年已达 89%。全国已建立城镇社区服务设施 10.1 万个，农村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已占 32%。律师事务所 7 万个，公证处 3000 个。与此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在发展中还注意了对老少边穷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和倾斜。希望工程、社会福利基金、人才培养、疾病防治、扶贫救济、计划生育等，都对落后地区采取了有效的重点措施。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在教育、医疗保健、妇女儿童等方面的贷款、援助，也主要用于发展贫困地区的有关社会事业。

——社会效益明显。1994 年以来，各项社会事业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提高人民身体、文化素质，丰富广大群众精神生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共培养大学本专科毕业学生 622 万人，是改革前 29 年总和的 2 倍。1981 年以来共培养博士研究生 1.4 万人，培养硕士研究生 25.8 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 1994 年达到 98.4%，每年扫除文盲 400 万人。目前，全国每年出版报纸 190 亿份左右，杂志 20 多亿册，图书 60 亿册。电影观众达 100 亿人次，文艺演出观众 4 亿人次。1994 年有 87% 以上的在校学生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急性传染病发病率由 1978 年的 2365/10 万下降到 1993 年的 190/10 万。大气、水、自然生态等突出的环境问题得到缓解或抑制，群众居住和生活环境有所改善。虽发生了多次较严重的区域性自然灾害，但均未引发瘟疫流行和社会问题。一度较突出的黄、赌、毒、腐败、刑事大要案增多等问题，开始得到整治，其间出现的一些局部性矛盾和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

2.9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在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的激励和指引下，我国的科技事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发展。

——科技队伍迅速壮大。1994 年底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达 2657 万人，是 1978 年的 6.2 倍。平均每万名职工中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1760 人，是 1978 年的 4 倍。

——科技活动全面展开。80 年代以来，国家从追赶世界科技发展水平的高度出发，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精心组织了各个层次的科技活动。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计划：10 年共取得成果 1.5 万项，获得经济效益 400 多亿元。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又称“863 计划”）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新材料等七个领域实施重点突破，已取得了 400 多项成果。火炬计划：到目前全国共有 52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达 1 万家。1993 年全国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479 亿元，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610 亿元，利税总额 75 亿元。星火计划：截止 1993 年底，全国已建立 43 个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共完成项目 5.1 万项，并为农村培训技术管理人才 1945 万人，为振兴农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 年以来，软科学研究在我国迅速崛起，至今全国已有软科学研究机构 60 个，研究人员 2.9 万人，取得 947 项成果。我国科技人员在国际上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从徘徊多年的世界第 15 位跃居第 12 位。

——科学技术国际合作与交流扩大。我国先后与 13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同 83 个国家缔结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和经济合作协定。在联合国系统 30 多个科技机构取得合法席位，我国学术团体参加国际学术组织 600 多个。近年来，官方对外合作与交流项目每年达 1 万项，比 1978 年增加了 8 倍。技术产品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1985—1993 年技术出口额

达 70 亿美元。

——取得了大批科技成果。1979 年以来，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21.7 万项，是改革前 30 年的 21.4 倍。所创经济效益超过 3000 亿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成效显著。在高技术领域，1979 到 1993 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 38 颗人造地球卫星，并能使卫星成功地返回地面，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掌握回收技术的国家。1981 年我国成功地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卫星，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法国之后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还成功地完成了水下导弹发射、洲际运载火箭、“长征三号”大推力火箭的发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5 兆瓦低温核供热反应堆建成并运行、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建成发电、“银河”巨型电子计算机、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导弹、卫星无线电测控系统研制成功，还有籼型杂交水稻和高产多抗性玉米杂交增产效果明显、乙型肝炎基因工程疫苗等等，标志着我国在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生物科学、计算科学技术、通信技术等领域，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2.10 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改善人民生活，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应当说，改革开放这 16 年，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生机最旺盛、国力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现在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一部分人已接近“小康水平”，还有小部分人已越过“小康”，正向“富裕”迈进，人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6 元增加到 1994 年的 1220 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由 316 元增加到 3150 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 8.3% 和 6.4%。收入的增加，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基础。

——1993 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为 1148 元，1978 年时仅为 175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从 1979 年到 1993 年平均每年实际增长 7%，高于前 26 年平均增长 2.2% 的幅度。

——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 1978 年的 210.6 亿元增加到 1994 年的 21519 亿元，增长 101.2 倍，年均递 33.5%。此外，居民还有 100 多亿美元的外币存款，手上还有 5000 多亿元的现金和 3000 多亿元的各种债券，总金融资产超过 3 万亿元。

——居民消费结构模式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表现为吃穿等生存资料的支出比重逐步下降，消费趋于多元化，质量不断提高：

食物消费，由吃饱到追求口味、营养。近些年，蔬菜市场的喧嚣热闹、副食店的琳琅满目和居民餐桌上的不断变化，都昭示着同一种时尚的变迁：即大部分居民家庭的饮食消费正在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求。现在全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粮食约 235 公斤、食用植物油 6 公斤、猪肉 18 公斤、牛羊肉 20 公斤、鲜蛋 8 公斤、水产品 7 公斤，糖果、糕点、水果及各种营养补品消费量也不断增加。现在，除人均消费的食用植物油接近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外，粮食、猪牛羊肉、鲜蛋的人均消费量均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1988—1990 年，我国人均每天食物热值和蛋白质含量高于发展中国家、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脂肪含量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服装消费：由保暖到追求潇洒、漂亮。人们也许没有忘记，十多年前，走在大街上，满

眼所见不是中山服就是列宁装，外国人戏称中国人是“蓝蚂蚁”和“灰蚂蚁”。如今，街面上五彩缤纷、款式新颖、新潮迭起的时装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对于服装的需求越来越倾向于舒适、高档、优美和个性化。目前，我国人民的纺织品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某些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布的消费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

用品消费：由实用到追求现代、高档。到 1993 年底，城镇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自行车 197.2 辆、缝纫机 66.6 架、洗衣机 86.4 台、电冰箱 56.7 台、彩电 79.5 台、录音机 75.5 台，应该说普及程度已相当高。钢琴、组合音响、录放像机、摄像机、汽车，也已开始进入部分高收入家庭。农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也不断增多，其中每百户拥有自行车 133.9 辆、缝纫机 62.3 架、手表 170.6 只、电视机 69.6 台（彩电 10.9 台）电冰箱 3.6 台、洗衣机 13.9 台。城乡居民拥有电视机的数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住房消费：由栖身到追求舒适、宽敞。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住宅建设迅速发展，并逐步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居民的住房条件大为改观。1994 年城镇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为 7.7 平方米，并已有 90% 以上的家庭使用上自来水，有 50% 以上的家庭使用管道煤气或液化石油气。一部分有条件的家庭还对室内装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致力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农民的住房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1994 年末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近 21 平方米，土草房、土坯墙瓦顶房逐步被淘汰，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占据了主要地位。

医疗保健条件大为改善，人民的体质明显提高，平均预期寿命已由解放初期的 35 岁提高到近 70 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已由试点转向实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全国现已有 50 多万户各类企业、8500 多万职工和 1850 多万名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已有 80% 以上的企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并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已初步形成兼有社会保障和转化、吸收待业职工功能的失业保障服务体系。

精神生活更加丰富，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必然唤起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当人们不再为一日三餐奔波、劳碌、发愁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了解外界的渴望。如今，自费旅游、参观游览、参加音乐会和晚会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还有 8000 万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近千万城镇人口收入水平还比较低，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扶持他们尽快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2.11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小结

规律之一：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什么时候的经济发展就是正常的、良好的。反之，什么时候脱离实际，头脑发热，急于求成，不尊重客观规律，什么时候的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波折。

规律之二：什么时候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什么时候经济就会获得快速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是健康的、稳定的。反之，就会出现偏差和动荡，就会危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危及社会主义的性质。

规律之三：什么时候处理好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什么时候的经济发展就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就会获得创造历史的动力。反之，则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影响改革与

发展的进程。

规律之四：什么时候处理好了各种经济比例关系，调整好了各种经济结构，什么时候国民经济就会协调、持续发展，尤其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必须始终加以维护。反之，就会出现失调和紊乱。

规律之五：什么时候真正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发挥其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什么时候的经济发展就会获得快速发展的力量源泉，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都会大幅度提高。反之，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沉重的。

规律之六：什么时候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什么时候的经济发展就有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保障。反之，就会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

规律之七：什么时候经济发展了，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如教育、体育等等）就会同时获得较快增长，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

规律之八：什么时候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什么时候经济发展的负担就相应减轻。否则，沉重的人口包袱将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步伐。

3. 体制转轨中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

3.1 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1992 年春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沿着逐渐淡化计划经济、强化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格局进行的，其最大特征是旧体制影响和新体制影响同时起作用，处于一种“胶着”状态。中国的经济建设基本上以解放农业和强化轻工业，并以此带动经济迅速增长的“产业结构轻型化”为特征的，着重解决的是人民的温饱问题。而 1992 年以来出现的新趋势，则主要表现为：改革由单纯打破旧体制转为建立新体制，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彻底消除旧体制的影响；开放由单纯地在沿海逐渐向内地发展，由粗放地以税收等优惠吸引外资转为让出一定市场吸引高新技术，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现与国际经济有机接轨；发展由解决人民的温饱转为解决小康，由“产业结构的轻型化”转为以适当强化重化工业的发展为特征的“产业结构重型化”，从总体上加快发展速度，力争提前实现翻两番目标。

在上述新的客观要求和主观目标的催促下，中国经济发展逐渐由“治理整顿”时期的“慢车道”进入“快车道”，1992 年经济增长率为 13.6%，1993 年为 13.4%，1994 年为 11.8%，明显快于 1989—1991 年平均 5.3% 的增长率。对外开放也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的全方位大开放的格局，外商来华投资迅速扩大，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到 1994 年进出口总额已突破 2000 亿美元，进入了世界第十大贸易国的行列。经济改革也在一些方面取得突破，尤以 1994 年财税、外汇等方面的改革成效最为明显，取得了预期效果，制度创新已开始迈出步伐。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充满希望而又极具挑战的阶段。

3.2 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新矛盾

中国的改革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的，它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性革命；中国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一个人口最多、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解决经济现代化难题和发展道路的确定所经历的充满了曲折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正因为这样，所以前进中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和挑战也就越多，这些挑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经济快速发展与改革相对滞后的矛盾。应该说，近几年我们在改革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定的步伐，特别是 1994 年各项宏观改革举措的顺利出台和所取得的预期成果，为建立一个新体制的初步框架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应看到，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离胜利的彼岸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有企业机制的转换，任重而道远。目前经济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建立在新旧体制并存的基础上，原有体制存在的吃大锅饭、软约束的弊端还在起作用，且在打破原有行政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新的体制在尚未完全确立之前，其不成熟性和局限性也在起作用，尤其是市场信号还是扭曲的，往往起着“误导”的作用，经济的快速发展还缺乏必要的体制条件。工作中稍有偏颇，经济发展即有由快速转变为过热的危险，因而损害整个发展进程，使国民经济陷入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环。

其二，经济的快速发展与通货膨胀的矛盾。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也不高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是一个由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的经济的国家。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过程中，在实现新旧体制转换中，在与国际经济接轨中，由于各种原因，客观上会伴生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通货膨胀，市场物价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必须承受的“阵痛”现象。如果对这种客观性看不见，主观上在现阶段硬要实施物价零涨幅或过低涨幅的调控措施，就可能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如果因为这种客观性，看不到通货膨胀可能产生的危害性、破坏性，不重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放松对供求总量平衡的调控，或过急地推进改革，或过高地追求发展，都可能加重通货膨胀，从而引起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甚至出现动荡。

其三，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矛盾。眼下最突出的是农业和交通、能源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这些领域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存在产出效益低的矛盾。这固然有长期以来忽视价值规律作用的影响，使这些领域的产品价格与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形成低利甚至无利的经营结局，各方面缺乏投资的积极性。但也应看到，在一些方面过去国家限制过多过死，社会资源难以及时地进入这些领域，如交通建设，过去只许政府投资，政府经营，从而影响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从农业看，还有人口巨大和农业资源相对不足并存的基本国情，农业始终是经济的薄弱环节。如果在快速发展中不加强农业、交通、能源等薄弱环节，势必使这种快速难以持久。而要改变这种局面，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实现的，尚需多方面的努力。

其四，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需求的矛盾。目前中国还处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时期，消费结构的变动与生产结构的变动存在一定的时滞，居民的消费由于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和